引言　中国的智慧　中国的兵学

战争这个怪物，几乎是与人类文明同时产生的。有了人类文明，便有了战争，便有了战争指导和有关战争指导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迄今为止，没有哪一种文化脱离过战争，也没有哪一种文化没有自己的战争与军事理论。然而，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像中国文化那样，孕育出了那么多的、那么发达的、那么成熟的兵书战策。

中国历史上究竟产生过多少兵书？由于水火兵燹等原因，兵书大量散佚。精确的数字，也许永远也无法弄清了。据《中国兵书知见录》的统计，中国目前存目的兵书为3380部，其中存世兵书为2308部。作者估计，加上散佚的兵书，中国兵书当在4000部左右。

这也就是说，从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算起，到清王朝被推翻，在大约2400年的历史中，中国平均每年要有1.7部兵书问世。

这是一个让其他任何一个文明古国都望洋兴叹的数字。

从兵书的质量上看，更是没有一个古代国家的军事理论著作能望其项背。《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位著名的美国当代军事理论家是这样评价《孙子兵法》的：

“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他于公元前 400—320 年间写成了最早的名著《兵法》。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二千二百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的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重要的意义。”

然而，当中国的《孙子兵法》宛若一颗巨星横空出世、照亮了迷雾重重的战争领域的时候，古希腊、古罗马的军事著作却还依然处于与史学著作不分的初级阶段。与《孙子兵法》相比，这些著作在学术水平上的差距真不可以道里计。直到公元一世纪，弗龙蒂努斯的《谋略》一书才初步显示了由传统军事史著向理论著作过渡的趋势。公元四世纪韦格蒂乌斯的（论军事）算是西方第一部纯粹的军事理论著作，而这时距孙子的时代，已经有 800 年了。其实，从中国兵书的角度来看，这部备受西方学术界推崇的《论军事》，在理论的洞察力与思想的深刻性上，仍然达不到孙子的水平。而此时的中国,早已经又诞生了诸如《吴子》、《尉缭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六韬》、《三略》等一系列的兵学经典。

兵法王国，中国当之无愧。

一个酷爱和平的民族，却为什么有如此发达的兵学传统？

人们试图从各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社会需求，战争频率，历史背景……

毫无疑问，这些答案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当我们将中国的兵家与兵学做为一种文化现象，放进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兵家与兵学，深深地植

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中国兵学高度发达的答案，只有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特性进行深入的了解之后，才会真正地找到。

“在一切实际事务中，中国人远远胜过一切东方民族。”

一百多年前，恩格斯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经过几代学人的文化反思，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民族性格有了更加清楚的理解之后，我们惊奇地发现，即使是同西方民族相比，中国人的这一特性依然十分突出。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既不是古希腊的知识理性文化形态，也不是西方中世纪的宗教文化形态，更不是近代的科学文化形态。中国人所执着的，是对人间世道的实用探索。

这就是学者们所说的中国实用理性。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在传统的中国人眼中，“知”“智”“学问”总是与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孔子说：“智者乐水。”中国的智者所乐的不是流水本身，而是如水一般的人生智慧。“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对于与现实无关的问题，中国人总是很难产生兴趣。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当古希腊的哲人们纷纷去追寻宇宙的起源、去探究自然的法则的时候，中国那位忧天的杞人却受到了世人的嘲笑。假如这位杞人生在了阳光明媚的地中海世界的话，也许西方又会多了一位哲人吧。

中国当然有对天道感兴趣的智者，荀子就曾经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然而庄子是推天道以明人事的，他的天其实是人化了的天，他的落脚点依然是在人事。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辨水平不如西方，中国多有舍事而言理的抽象著

作，如《老子》。问题的关键是思辨的内容，老子所思考的，依然是历史和现实的成败得失与吉凶祸福。

中国人的这种文化精神，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经奠定的。庄子在他的《天下篇》中把春秋战国称为“道术为天下裂”的时代，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这是一个文化大分裂的时代。有意思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都各自独立地发生了文明的裂变，文化史学家称这一时期为文化突破的时代，或者称之为“轴心时代”。正是这次文化的大裂变，奠定了世界不同文化的不同精神与不同走向。但由于不同的历史渊源，不同文化的突破方式与内涵有很大的差别。在文化史学家们看来，希腊文化的突破，表现为“哲学的突破”，以色列文化的突破表现为“先知运动”，印度文化的突破表现为“宗教的突破”。中国文化的突破，则表现为“王官之学”的裂变。

所谓的“王官之学”，就是西周一整套以礼乐为核心、以治国方略、礼仪规范、教化数术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传统。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突破的胚胎，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实用精神。“道术为天下裂”的结果，是从统一的“王官之学”中裂变出了儒、道、法、墨、纵横、阴阳等诸子百家之学。诸子所追求的，是“思以其道以易天下”。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由此确立。

中国人的理性就在这百家争鸣、各逞异说的相摩相荡中迅速走向成熟。春秋战国，这是一个产生了多少文化巨人与巨著的时代！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这么多不朽的名字！两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即将跨入一个新的千年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生命之火的炽热。他们的生命，连同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智慧，早已

融入了中国文化的长河之中。

那么，中国实用理性的灵魂是什么呢？

是辩证法。

是产生于现实、立足于现实、而又反过来指导现实的辩证法。

这是一片肥沃的文化土壤。正是在这片中国人所特有的文化土壤中，产生了中国的兵学。

西方著名的汉学家李约瑟先生在谈到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时曾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到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这一见解是很深刻的。与长于形式逻辑的西方相比，中国人所擅长的，正是这种以辩证法为主体的、经验的、非形式逻辑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与形式逻辑有很大差异，如果说形式逻辑是致力于考察自然界本身的属性规律，辩证思维则侧重于对现实事物进行整体的、动态的把握，注重事物的普遍联系、能动转化和循环发展。显然，辩证思维更适于从主体的角度反映和驾驭经验知识，反映和驾驭现实的矛盾运动。

由于背景的不同，中国的辩证法内部有着不同的流派，如老子以“柔”为中心的辩证法、孔子以“中”为中心的辩证法、《易传》以“刚”为中心的辩证法……但无论是哪一种流派，中国的辩证法都是现实经验的概括，都与现实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都具有极大的经验丰富性，因而也就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性。中国的辩证法所执着求索的，是隐藏在治乱、兴衰、得失、成败、吉凶、祸福背后的客观规律（用中国哲人自己的话来说，是“求道”），以及由此决定的主体的或进或退、或刚或柔，或先或后、或攻或守。当这种辩证法与军事问题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便形成了以追求“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道”为特色的中国古代军事辩证法。而中国古代兵家所提出来的一系列独特的范畴如刚柔、全破、形势、虚实、奇正等，更是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方式有直接的关系。

这是中国兵家的灵魂所在，这是中国兵学的特色所在，这也是中国兵学从一开始便远远高出西方兵学的关键所在。

智者乐水。智者动。的确，中国智慧的核心，是动态的辩证法。而体现中国智慧基本性格的，莫过于灵动的流水了。无怪乎中国的兵家是那样的喜欢用流水来形容用兵。孙子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又说，“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胜，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行，兵因地而制胜。”这段据说是当代美国高级将领最喜爱的名言，最形象地揭示出了中国智慧与中国兵学之间的内在关系。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兵学，早已与中国的智慧融为了一体。中国文化史上有四部五千言：《老子》、《论语》、《周易》和中国兵家的代表作——《孙子》。正是这四部五千言，构成了中国智慧的四大支柱。

所以，要想真正了解中国的兵学，就必须了解中国的文化。

要想真正了解中国的文化，也必须了解中国的兵学。

一、兵家三变

——传统兵家的形态更替

文化与兵家

诸葛亮大概是中国最家喻户晓的军事人物了，这当然与（三国演义）的艺术魅力有关，但更关键的是在诸葛亮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成熟的中国文化，是儒、道、法三家的互补。儒家的王道与理想，道家的无为与超越，法家的功利与实际，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缺一不可的三个层次。诸葛亮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这是道家的风韵；自比管、乐，雅好申商，教令严明，信赏必罚，是法家的施为；陈寿说他“以逸道使民，虽劳而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怨杀”，又是醇然的儒者了。在中国人的心中，一个伟大的兵家，就应该像诸葛亮那样，既具儒家的胸襟，而兼道家与法家的权略的。

这是就中国文化的整体而言的。文化就像一条河，一条生生不息的长江大河。长江只有一条，但是，上游的从容不

迫，中游的蜿转湍急，下游的一泻千里，却向世人展现了同一条长江的不同风采。文化也是如此。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说，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中国文化，同样展现出了不同的风貌。先秦是中国文化的发源时期，中国文化长河的几条主要的支流都已经蔚为可观，并呈现出汇合之势，但代表这个风起云涌时代的基本精神的，在北方，毫无疑问应是起始于齐、晋而大用于秦国的法家，在南方，则是发源于楚地而影响于吴越、乃至浸润到齐地的道家了。从汉初开始，道家成为一种超越地域局限的思想流派，一直到隋唐，中国的哲学、宗教、文学之中所弥漫不绝的，依然是道家的精神。至于儒家，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起，形式上一直被奉为正统的统治思想，但从骨子里而言，汉唐统治者都是霸王道杂用之的。儒家真正在多元的文化格局中取得核心的地位，是理学诞生以后的事情了。

中国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流变，体现了中华民族无穷的生命力。而中国文化的流变不已，又在中国兵家的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与中国文化的流变相呼应，中国的兵家也出现了法兵家、道兵家、儒兵家这三种不同气质的兵家类型。

兵家类型之一：法兵家

从吴起与商鞅的身份说起

先秦时期，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在北方地区，不少法家具有兵家的身份，而不少兵家也同时具有明显的法家气质。吴子是著名的兵家，他在魏国为将时与诸侯大战七十六次，其中全胜六十四次，平手一十二次，“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奔楚之后，吴起又统率楚军，“南

平百越，北平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取得了赫赫战绩。吴起所著的《吴子兵法》，更是一部与《孙子兵法》齐名的不朽兵学经典名著。但吴起还有另一重身份，司马迁说他担任楚相之后，“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雷厉风行地进行变法，这又是粹然法家了。

商鞅则是正宗的法家——没有商鞅的变法，中国的统一会不会由秦国来完成，大概是很难说的。然而商鞅还是一位杰出的兵家。《荀子·议兵篇）说：“齐之田单，楚之庄跷，秦之商鞅，燕之缪虮，此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汉书·刑法志》也说：“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诸篇籍。”足见在战国和秦汉人的眼中，商鞅的形象还是一位名将。其实商鞅不仅擅长用兵，而且长于论兵。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除法家著作《商君书》之外，商鞅还有一部兵书叫（公孙鞅》，共二十七篇。这部兵书现在已经失传了，但从《商君书》中的《战法》、《立本》、《兵守》等论兵专篇依然可以看出，商鞅在军事理论上的造诣，的确是很深的。

这种身兼兵家、法家双重身份的现象，并非自吴子、商鞅始。孙子是论兵者之祖，后人誉之为“兵圣”，然而他的吴宫教战，却是典型的法家作风。在他的《兵法》中，孙子更是将“法”列为五事之一，将“法令孰行”、“赏罚孰明”列为七计中的两项，将“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列为治军的基本原则。孙子的法家倾向，应该说是很明显的。

而被认为的法家鼻祖的管子，在军事上也颇有一套，他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南征北战，奠定了齐国霸业的基础。在反映管子思想的《管子》一书中，并有《兵法》等专门论兵的内容。有的学者由此认为先秦应该是存在一个

管子兵学流派的。可见管子与兵家之间，也是有关联的。

这种文化现象，我们姑且称之为法家与兵家的“共生”现象。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文化现象呢？

同源而异流

这种文化现象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兵刑合一”的传统。《尉缭子》给兵家下的定义是：“凡将，理官也。”吴起论将，首先强调的便是“理”。理官是什么？理官就是掌刑罚之官。而且，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理官是法家的老祖宗。法家者流，就是由理官演化而来的。可见早在理官身上，就已经有了兵家与法家共生现象的影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理官是皋陶，（尚书·舜典）说舜命皋陶“作士”，士就是理官，也就是刑官。然而舜交给皋陶的任务是什么呢？是用兵对付“猾夏”的“蛮夷”。在古人看来，大刑用甲兵，次刑用斧钺，甲兵与刑罚都是国家暴力，作用是一样的，这便是理官既掌兵、又掌刑的原因所在。由此可见，兵家与法家，本来就是同源而异流的关系，二者之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就并不奇怪了。

共同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法家与兵家，都是在春秋战国之际传统社会“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诞生的，又都代表了生机勃勃的新兴势力的利益。读过《孙子》的人都知道，《孙子》一书中所弥漫的，是进取的精神，刚健的精神，自信的精神，战斗的精神。这是新兴势力的锐气所在，这是真正的时代精神。而法家身上所体现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一往无前的精神。共同的政治基础，使法家与兵家有着共同的政治追求——二者都强调以战争的手段来摧毁旧的政治结构，来为新兴势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兵家是明确主战的，孙子公开宣称

的是“廓地分利”，是“伐大国”；孙膑公开宣称的是“战胜而强立”，是“必攻不守”；法家也是明确主战的，法家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在战争的问题上，法家的态度甚至比兵家还要激进，认为“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在先秦诸子中，法家的战争观与兵家是最为一致的。我们不妨拿道家和儒家立场与法家做一个比较。道家从本质上是反战的，老子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所以“有道者不处”；儒家从本质上也是非战的，孔子追求的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追求的是“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从道德评价的角度来说，老子与孔子的和平主义的追求，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从历史评价的角度来说，就当时而言，这恰恰是一种没落的、与历史潮流相背的观点。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是社会运动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战争正是起着助产婆的作用。战争给社会带来了苦难，但一个全新的社会，正是在血与火的苦难中诞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是法家和兵家，而不是道家和儒家。

由此我们便可以明白为什么会出现法家与兵家的共生现象了。就法家而言，法家是将战争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杠杆的，法家本身便是一个军事性很强的学派；就兵家而言，兵家本来就是在新兴势力向传统势力发起挑战的风云激荡中诞生的，做为新势力扫荡旧势力的利剑，兵家带有明显的法家气质是必然的。尤其是进入战国以后，富国强兵、统一天下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而统一只能依靠战争，战胜必须依靠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时代的需求使兵家与法家更为密切地结合在了一起。由此，当我们看到战国的法家自豪地称自己为“耕战之士”，战国的兵家在回答什么是强兵之急时直接了当地讲“富国”，而战国的儒家大骂法家该死时骂的是“善战者”，凡此等等，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法兵家的功利主义

兵家与法家这种一体共生的关系，对先秦北方兵家的基本性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先秦的北方兵家与其他类型、其他地域、其他时代的兵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其明显的功利主义精神。孙子讲“兵以利动”，讲“非利不动，非得不用”，讲“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讲“因利而制权”，讲“廓地分利”……其价值观的核心，无疑是功利主义。而法家的意义就在于，正是它，从价值观的层次，为先秦北方兵家的生长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功利主义的文化土壤。当我们读《管子》读到“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读《商君书》读到“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读《韩非子》读到“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的时候，就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北方的兵家与法家这种最深层次的精神契合。从北方兵家的主体精神上说，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法兵家的。实际上，中国的古典兵学之所以只有春秋战国一个高峰，与法家为兵家提供的这种文化土壤有很大的关系。儒家是“何必曰利”的，法家的主体精神则是现实的功利主义。齐、鲁近在咫尺，儒风弥漫的鲁国没有发展出象样的兵学，法家思想流行的齐国与三晋却孕育了那么多杰出的兵家，这真是一个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现象。从根本上来讲，是法家的功利主义，而不是儒家的伦理主义，与兵学的发展机制有深刻的一致性。《孙子兵法》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部划时代的兵学经典，

与时代为孙子提供了冲破温情脉脉的宗法伦理迷雾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念有很大关系，它使孙子能够以现实的眼光去审视战争，去解剖战争，从而提出了“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光辉命题。正是这个命题揭示出了战争和战争指导的本质属性，中国古典兵学的辉煌大厦，也正是建立在这块坚实的基石之上的。

秦汉之后，随着法家的解体，兵家的生长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同质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支持，而儒家伦理主义的膨胀，使中国文化之中现实的功利主义受到很大的压抑，这对中国兵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汉代以后，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先秦兵家的功利与诡诈受到了越来越猛烈的抨击，孙子、吴子等法兵家那种鲜明的个性，在后世兵家的身上也逐渐淡化了。兵家的主体精神，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

然而，中国的古典兵学的基础，毕竟是由法兵家确立起来的，在价值观的层次，可以对兵学进行改造，但孙子所揭示出来的战争规律，却是否定不了的。因此尽管历史上不乏攻击“孙吴之术”的腐儒，但孙子、吴子等人在兵家中的地位却始终没有动摇。同时，兵家与法家之间的关系，在法家作为一个学派解体之后，也依然是或明或暗地存在着的。在晁错身上，在曹操身上，我们依稀仍然可以看到这种文化现象的影子。

兵家类型之二：道兵家

老子的双重性格

兵家与道家的缘源，几乎与兵家与法家之间的关系一样

久远。《老子》是道家最重要的典籍，但不少人明言《老子》其实是一部兵书；范蠡是一位著名的兵家，他的用兵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范蠡也是道家黄老学派的开山人物；张良是刘邦的主要谋士，他的道家风骨更是人所共知的；一直到唐代的李泌、李筌，这种道家与兵家相兼的现象依然十分突出。

在今天看来，《老子》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兵书，但是，《老子》之中包含了大量的论兵内容，却是无容置疑的。要想真正了解范蠡、张良这些道兵家，是必须从老子说起的。

老子的性格是矛盾的。在《老子》一书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两个老子。一个老子是出世的，悲观的，他否定社会，鄙弃文明，痛恨礼法，要求回到那个无知无欲、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另一个老子则是入世的，积极的，他全力倾注于成败、得失、吉凶、祸福之道和刚柔、强弱、雌雄、动静之术的探索。出世与入世，超越与现实，就这样矛盾地集于老子一人之身。

这种矛盾的性格，在老子对待战争的态度中同样体现了出来。在超越的层面上，老子是否定战争的，他将发动战争视为“无道”的行为：“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然而在现实的层面上，老子又不得不接受了战争，容许“不得已而用之”。这种矛盾的心理，使老子要求以哀戚恬淡的心情来对待战争：“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也。”“杀人之众，以哀悲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道兵家的恬淡

这种恬淡处之的精神追求，是理解道兵家的关键。这种看似与兵家格格不入的气质，对于兵家来说，恰恰是一种最

高的精神境界。兵凶战危，人们极易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失去自我。而道家对待战争这种哀戚恬淡的心境，使道兵家能够超越一时一地的得失、荣辱、成败、利害，而始终保持着一种不以得喜、不以失悲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种局外者的淡泊与清醒，它使道兵家能够对形势的发展进行长远的、洞彻的观照，从而做出冷静的判断和把握。由此可见，正是老子的这种性格，塑造了道兵家与法兵家的那种进取、刚武有很大差别的基本精神风貌。从历史上看，凡是与道家有渊源的兵家，大多表现出一种淡泊宁静而略显柔弱的气质。司马迁说他原以为张良是一个魁梧奇伟的猛男子，后来见了图画，才知道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张良的气质，正是道家恬淡的精神追求的外在体现。

这种恬淡的精神追求，也体现了道兵家所特有的人生智慧。兵家产生于王权时代，专制王权的特点就是它的排它性。对于兵家，专制君主从来就是既利用、又防范的。法兵家崇尚的是建功立业，而专制时代的功臣似乎总是难以避免“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按照《汉书·刑法志》的说法，“孙、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国灭亡于后”。孙子的结局，有不同的说法，我们宁愿相信他是归隐了，但吴起、商鞅、白起三人，史书上却明确记载是被杀了。这是法兵家的悲剧，而这种悲剧结局的产生，应该说与法兵家自身刚健有余的性格也有关系。道兵家则不同，道家是讲究“为而不恃，长而不有”、讲究以出世的精神入世的。道家的恬淡与超越，使道兵家大多自觉地将“功遂身退”作为自己的人生选择。在范蠡身上，在张良身上，我们都能看到这种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

守柔的战略追求

与法兵家相比，道兵家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其战略思想以“守柔”为基本特色。老子尚柔，这是人所共知的。“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柔弱胜刚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弱者道之用”，“守柔曰强”……诸如此类的论述，在（老子）一书中随处可见。所谓的“守柔”，就是韬光养晦，后发制人。老子对此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论述：“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后世的道兵家对于老子思想的其他方面可能有所扬弃，但以屈求伸、后发制人却始终是道兵家战略思想的灵魂。范蠡辅佐勾践灭吴用的是这一战略，张良辅佐刘邦灭楚用的是这一战略，《鹖冠子》、《文子》、《黄老帛书》、《淮南子·兵略训》、《三略）这些道兵家的代表作所再三着意的，也正是这一战略。道兵家的这一战略智慧，对传统中国战略文化的基本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不过，韬光养晦、后发制人的战略，却并不是道兵家首创的。早在殷周之际，深通韬略的吕尚——也就是姜太公——便提出了恭顺事商、麻痹纣王的策略。根据《资治通鉴外纪》的记载，吕尚向周文王说了这样一番话：“鸷鸟将击，卑身翕翼；猛兽将搏，俛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不难看出，这正是守柔的策略，韬光养晦的策略，以屈求伸的策略。它与老子的“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在思路上完全是一致的。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显然，做过周室守藏史的老子，一定是从吕尚这里得到过启发。老子的伟大之处在于，是他，第一个将太公的战略实践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理论化、系统化的总结，从而奠定了道兵家的理论基础。

太公的道家化

有意思的是，在后人的眼中，太公往往是以道家的形象出现的。《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这些著述已经失传了，有的学者认为，流传至今的《六韬》大概就是《兵》八十五篇。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被称为“太公书”的著作，都是托名太公的，真正的作者，应该是战国时期齐国一群对太公的事迹与思想很有研究、并奉太公为开山之祖的兵家。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著述在《汉志》之中是被列入道家类的。我们知道道家的诞生与最早流传，是在楚文化圈的范围之中。最早的道兵家群体，也是产生于楚文化圈中的。范蠡可以说是第一位道兵家，在楚文化圈中以“黄帝书”的面貌出现的南方道家兵学，其实就是在范蠡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而太公形象道家化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道兵家已经超出了楚文化圈的范围，而出现了两大分支：一是以范蠡为宗、盛行于楚文化圈的南方道家兵学，《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范蠡》两篇、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是其代表作；一是以太公为宗、盛行于齐文化圈的北方道家兵学，代表作是托名于太公的《六韬》、《三略》。《李卫公问对)说‘张良所学,太公(三略》、（六韬）是也”，张良是典型的道兵家了，如果我们认为（问对）所说有根据的话，那么，看来先秦确实是存在一个属于道兵家的太公兵学流派的。张良的老师黄石公，则应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为数不多的太公兵学流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谋士与战将

（李卫公问对）中还有一句话：“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显然，在《问对》看来，张良、韩信代表了中国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